

# “永明体”与永明时代再探

□ 袁济喜

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 北京 100872

永明体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南齐永明年间产生的一种文体现象,它以内容华靡、讲究声律、形式工美为特征。南齐武帝萧赜即位后的永明年代,是南朝重要转折年代,也是学术繁荣,文学昌盛的时代,出现了以沈约等人为代表的永明体现象,对于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用。然而,在长期的研究过程中,存在着将永明体等同于永明文学,进而与整个永明时代相割裂的现象,遮蔽了整个永明体与永明文学的本来面貌,导致了对于整个永明体与永明文化的看法囿于一隅,未能窥其全貌。

永明(483—493)是萧齐武帝萧赜的年号,是萧赜继齐高帝萧道成之后称帝统治的时期,共计11年。不可否认,永明年代是一个外表承平的年代,萧道成、萧赜父子有鉴于此,大力推举儒学,特别是孝道。在他们的举荐下,形成了以王俭为首的儒学集团,推动了儒学的昌盛。竟陵王萧子良则形成了竟陵八友的文士集团。儒学集团与文士集团既互相勾连,又互相制约,形成了永明文化的特殊风景,当时的统治相对于刘宋时代频繁的内乱,相对承平,这也是无可否定的。

然而,永明年间却是一个与魏正始年代十分相似的年代,永明十一年与正始十年非常相似,即外表的学术与文化繁荣,恰恰是内在的政治凶险的折射。关于这一点,是目前研究永明体与时代关系的论著最忽视的。齐武帝外表喜怒不形于色,实际上内心的忌刻与猜忍不亚于刘宋时代的那些皇帝,他即位当年即杀死了他不喜欢的文士谢朝宗,原因是谢的不恭。正是对于皇室的猜忌,他对于素有贤明之称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并不信任,关键时刻将继任大权交给萧昭业与萧鸾,导致萧子良被黜,最后郁郁而亡。萧鸾即位为齐明帝后,将萧道成与萧赜的子孙辈诛杀殆尽,留下了为后世唾骂的恶名,比诸刘宋朝的皇室骨肉相残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文士,也就是永明体的主体作家,如沈

约、范云等人,卷入了永明年间的政争,其中又分几类人:一是死心塌地投靠诸王、以身家性命博弈,比如竟陵八友的王融,出身琅琊王氏,才华出众,深得萧子良信任,因此,竭力帮助萧子良在齐武帝病重时谋夺大位,关键时刻功亏一篑,在萧昭业即位后旋即遇害。范云则始终助力萧衍即后来的梁武帝谋位。二是善于观风使舵者,比如沈约,先为文惠王萧长懋的太子家令,后又投靠竟陵王萧子良,在文惠王死后改换门庭,成为萧衍的谋士,帮助萧衍夺取政权,取代萧齐,建立萧梁政权。三是游移不定之士,如任昉这样的人物,由于政治根基不深,又没有高门甲第的家世背景,只好游移于各个实力人物之间,择主而事。四是还有一种人物虽然出身于世家大族,但是在萧齐时代,王谢家族已然中衰,只好在新旧王朝与各个皇帝之间求生,始终无法摆脱谢灵运那样的政治悲剧,永明体最有成就的诗人谢朓即是这种人物。而永明体的咏物写志,大都不出身边琐事,嘲风雪,弄花草,与文士在政治斗争中的这种游移不定、得过且过的人生态度与人格精神有关。

永明时代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种特殊背景下生成的,它是从刘宋向梁陈转变的契机。其基本特征是由刘宋时代的重文章转向崇尚儒学。这当中的重要人物,当属王俭。王俭善于将古礼与今用相融会。王俭善于引纳人才,在士子中具有广泛影响,成为士流心目中的偶像,他也经常以江左风流宰相谢安自居。这些综合因素,促使南齐永明文化向着儒学方向发展,改变了刘宋时代重文学而轻儒术的风气。

齐武帝萧赜好儒学,而他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则喜欢延揽文士,嗜好学术,所谓“竟陵八友”应运而生。但是萧子良与正始年间的曹爽一样,是一个没有政治远见,性格懦弱的首辅。萧子良在齐武帝病重时,没有抓住机遇,反而将权柄授予野心勃勃的西昌侯萧鸾。当时因为政争与杀戮横行而吓破胆的文人绝非个别,在这种残酷的永明政争中,永明体作

家的内心世界,也绝非宁静怡然,他们的文学作品与文学主张,不可能脱离当时险恶的政争而超然物外,只是采取的应对措施在讲究诗歌的声律追求以及相关的创作特点上,这一点应当是肯定的。

在当下许多研究永明体的论著中,往往将萧子良文士集团与诗文创作联为一体,而忽略了其中的具体内容,似乎萧子良文士集团纯粹是一个诗文酬唱的文士集团,永明体则是在这种诗文酬唱氛围中形成的。这一看法其实是以偏概全。

萧子良开西邸,并不仅仅是为了诗文酬唱,而是从事以佛学为主的宗教活动,萧子良在佛教事业上的投入,远远胜过他在诗文活动上的功夫。永明年代以萧子良为代表的文士的学术活动主体并非考论声律,声律考论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单元,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今人研究永明声律说与永明体,不能脱离永明文化与学术的总体环境,这样才能厘清它产生的原委。当时文章与谈义往往相提并论,是指与学术相关的内容。

竟陵王萧子良开西邸延揽文士,活动的内容并不仅仅是诗文酬唱,还包括清谈。文章与谈义并列,说明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文章并非写作诗文之事,而是传统的文章博学之义,指学术论辩一类的内容,早在魏晋玄学与清谈中,言辞的音韵声律就成为表达的重要内容,清谈促进了言辞中的声律协调,音调铿锵、抑扬顿挫亦是自然中事。结合永明时代的整体学术氛围,诗文的声律之说只是整个永明文章谈义中的一部分,片面夸大与孤立地考论诗歌的声律说,并将其无限放大,显然有失公允。

永明时代,学术形成了多元发展的态势,与文学活动直接相关。这方面可以从活跃于永明年间的一些人物看出。张融就是一个著名的人物,他为人放荡不羁,颇有魏晋名士风度。与张融相好的周顼精通声律,也是一位儒道佛玄兼修的人物,周精于声律音韵,是从佛学发端而来,依托佛学而构建,并非发源于诗歌声律。永明声律说的重要人物张融、周顼的声律说与沈约的四声八病说的来源理论,有很大的不同。

在永明文学活动中,诗歌创作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据逯钦立先生所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统计,《全齐诗》337首,大部分的诗人生活在永明前后,永明体的代表作家沈约、谢朓、王融的作品数量较多。永明体的一大特征,是从当时民间诗乐中汲取了滋养,用以填补文人诗歌作品内容的空虚。永明体的最大成就是将声律论初步运用在五言诗的写作中,对于唐代近体诗的形成作出了铺垫,但是题材狭窄,情志浮靡,流于生活的表面,而缘饰以声律。

永明时代的文学,除了诗歌外,还有各类文章,这些文章往往比诗歌成就更大。梁代萧纲在《与湘

东王书》中指出:“至如近世谢朓、沈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实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这就清楚说明了永明年代文体的布局:作为声律说肇始的永明体诗歌,仅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作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沈约当时除了诗文写作之外,最有成就的恐怕是他的史传写作。沈约所撰《宋书》在史学上成就颇高,永明声律说正是在其中的《谢灵运传论》中提出的。这些分析,都充分说明永明文学中,与永明体相关的诗歌作品仅是其中的一部分,且并不占主体,用永明体来指称永明文学的全貌,进而将永明体说成是永明时代的文化主流,显然偏离了历史事实。

永明年间,外表承平,而几大政治集团以招集文士的方式来笼络人才,扩充地盘,聚集势力,为最终夺取帝位早作准备。沈约最早投靠文惠太子,为太子家令,深受宠信,同时又靠近当时另一位大人物,这就是竟陵王萧子良。齐武帝对于当时势力最大的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集团一直心存忌惮,关键时刻没有授予萧子良兵权,即是明证。而沈约等人在齐武帝心中乃文士而已,不被重用。沈约的永明年间的生活与文学创作,带有当时的时代特点,主要是虚与委蛇,观风使舵。他的诗歌写作与诗歌主张,并不是永明年间承平景象的真心讴歌,而是对于外表承平、内里险恶实质的应对,可以说是一种人生态度与文学写作策略。沈约的永明声律说与他的文学主张存在着明显的矛盾之处。梁武帝虽然与沈约同为竟陵八友,诗文交往很多,但是梁武帝对于沈约倡导的声律说并不感兴趣。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极其复杂,大体上有两种,一种是真实地写出了社会现实与思想情感,如东汉末年的建安文学,以三曹与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思潮,以真实反映社会现实、慷慨仗气为特征,史称建安风骨;另一种则是对于外表承平、内里凶险的现实采取一种逃避现实、自我麻痹的态度。这些都说明,六朝时代的社会现实与文学写作的关系并不总是顺向的,往往是逆向的折射,成为士大夫逃避现实的幻影,永明体便是以折射的方式,反映出永明年间外表承平而内里凶险的现实,以及君臣之间的复杂心态。沈约死后被梁武帝批评“情怀不尽日隐”,也说明沈约所倡导与鼓吹的永明体正是他所代表的永明文士扭曲隐约心态的表现。同时,永明时代的文化也是多元交织的,永明体作为诗歌创作与理论主张,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完全覆盖永明文学,更不能用来说明永明文化的全部,对于它的出现及其评价,应当加以全面的分析与论述才是。

■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约14000字